



音乐学新视界丛书

近现代广东音乐家研究

冯长春 主编

李明辉 副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音乐学新视界丛书

近现代广东音乐家研究

冯长春 主编

李明辉 副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现代广东音乐家研究/冯长春主编;李明辉副主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

(音乐学新视界丛书)

ISBN 978 - 7 - 5668 - 0028 - 2

I. ①近… II. ①冯…②李… III. ①音乐家—人物研究—广东省—近现代—文集 IV. ①K825.7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786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8620) 85221601

营销部(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20.25

字 数:397 千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

定 价:4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音乐学新视界丛书编委会

丛 书 主 编 黄汉华

编委会成员 郭声健 蒲亨建 冯长春

王海英 孔义龙 仲立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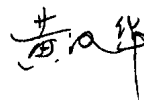
总 序

本套丛书系以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为主体推出的一批学术成果，涉及音乐与舞蹈学中音乐美学、基础音乐教育、古代音乐史学、近代音乐史学、传统音乐、舞蹈理论与教学研究等多个研究领域，是近年来音乐学院学术团队承担各类省部级科研项目、主办学术论坛、参加国际国内会议以及指导各领域教学所获得的学术成果的一次展示。

音乐美学领域推出的成果将符号学理论引入音乐美学，将音乐与现实的反映问题和音乐符号意义问题作为核心，旨在为传统音乐美学研究中诸多问题找出新的诠释途径。基础音乐教育领域推出的成果以粤、港、澳三地音乐教育的现状和比较为内容，打造出三地常态化的良性音乐教育论坛机制和实践性、指导性研究模式。古代音乐史学领域推出的成果以音乐实物为主要对象，对钟乐的数理关系、岭南古乐及史学学科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近代音乐史学领域推出的成果以近现代广东音乐家为研究对象，较全面、系统地展现广东音乐家对近现代中国音乐发展的贡献，反映当代音乐学者对近现代音乐与音乐家全面、客观的评价态度。传统音乐领域推出的成果以戏曲唱腔和传统音乐形态理论为研究对象，对京剧梅派和粤剧红线女唱腔，以及传统均、宫、调的理论与实践作出合理的评价和系统的分析。舞蹈理论与教学领域推出的成果以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为主要对象，结合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研究及现代创编进行富有成效的应用性理论探索。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成立于2007年3月，是一个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的研究实体。研究所现有在编研究人员8人，其

中博士 6 人、硕士 1 人、在读博士 1 人，教授 5 人，结构健全、层次合理，在学术界已初步产生良好影响。本批成果反映了该团队学术研究的一个侧面，此后还有系列成果陆续推出。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黄风华' (Huang Fenghua). The signature is stylized with fluid, connected strokes.

2011 年 7 月 16 日

群体的崛起

——近现代广东音乐家研究巡礼

(代序)

广东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方面，都足以成为中国文化地理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符号。特别是晚清以降，随着开埠通商、基督教和西方政治、文化输入的影响，带有鲜明海洋文化传统特征的岭南文化在广东得到了进一步的嬗变和发展，勇于吐故纳新乃至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革命思想和敢为天下先的实践精神，成为岭南文化、广东精神在近代以来的一个鲜明标志。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岭南文化精神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推进作用，生动地体现在那些生长在这一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身上。论及广东的历史人物，人们首先会想到出生于广东的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影响乃至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家。毫无疑问，近代广东政治家群体的出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精髓就是开放的文化胸怀、政治气魄以及敢于批判和革命的勇气与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这种胸怀、气魄、勇气和精神同样反映在文化艺术的革新与创造中，近现代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

抛开广东音乐的传统不论，着眼于 20 世纪以来中国音乐的转型和新音乐文化的肇始与发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广东这片土地上竟然诞生了一大批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的音乐家！我们可以列出一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广东籍音乐家名单：萧友梅、青主、陈洪、冼星海、马思聪、何安东、郑志声、李凌、廖辅叔，等等。这些音乐家中既有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者、西方音乐理论的引进者、新音乐创作的先行者，也有新音乐运动的推动者、音乐美学思想的新论者以及音乐指挥、音乐批评等领域的开拓者与佼佼者。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如果缺失了上述广东籍音乐家的坐标图，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历史面貌将会是怎样的格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广东音乐家的出现与成长是一个群体的崛起，这个崛起的群体为中国近现代新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贡献!

当我们把以上述人物为代表的近现代广东籍音乐家的群体崛起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看待,特别是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新音乐文化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加以考察时就会发现,近代以来的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和西学东渐的开放性文化语境,在上述音乐家群体中得到了非常鲜明的体现和发展。尽管有些广东籍音乐家在成名之后离开了广东,成为在全国乃至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音乐家,但近代以来开放的岭南文化精神已经深深地烙在他们的音乐人生中,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化标记。也正是这种面向世界、敢于创新的音乐精神,最终使以萧友梅、冼星海等为代表的广东籍音乐家成为中国近现代新音乐文化的领军人物,其重要的历史影响早已超越了广东地理与文化一隅。

如果进一步对上述近现代广东籍音乐家群体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

一、欧风美雨的亲历者和西乐东渐的推动者

今日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而在近代中国,广东也是最早开埠通商、引领风气之先的地方。作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地,随着一系列开埠条约的签订,19世纪中叶的广州逐渐成为东西文明交汇之处。在清廷日趋腐朽、欧风美雨东渐的历史境遇下,广东这片土地培育了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敢于远涉重洋游学海外的有志之士。1847年,广州青年容闳在黄埔港登上了一艘驶往美国的帆船,成为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八年后,他成为耶鲁大学同时也是美国 and 整个西方的首位中国毕业生。这个文化事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深远的辐射性影响。此后,一大批探索救国之道的仁人志士开始了前赴后继的西学之旅。外来文明的熏陶和敢于接纳、学习新事物的文化精神,也是近现代广东籍音乐家成为中国新音乐文化建设之精英与先进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容闳及其后学者一样为求新知,他们大都远涉重洋,东渡扶桑抑或西游欧美。比如曾先后留日、留德的萧友梅,留德的青主,留法的陈洪、马思聪、冼星海、郑志声等。他们有的毕业于专业音乐学院,有的则通过选修、自修等方式接受了较为系统甚至非常专业的西方音乐教育。何安东、廖辅叔、李凌等人虽没有留洋学习音乐的经历,但年少时在国内也受到了西方音乐文化的深刻影响,有的则较早和比较全面地在国内受到了西方音乐的熏陶与教育。因此,这些音乐家的共同点之一就是他们大都是欧风美雨和学院教育的亲历者,这也是他们日后成为新音乐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浸淫于西方音乐文化的亲身经历,这些音乐家才成为西方音乐文化

输入中国的推动者和传播者。尽管有的音乐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曾对西方音乐文化作过强烈的批判甚至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西方音乐文化的反对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在以萧友梅、陈洪、冼星海、马思聪、青主为代表的一大批音乐家的共同努力下，西方音乐理论及其实践通过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欣赏和音乐批评等方式，日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使中国音乐文化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中国音乐转型和新音乐文化建设的开拓者

创造俄罗斯民族乐派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乐派，一直是萧友梅、陈洪等这一代音乐家的梦想。事实上，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音乐家无一不以自己的音乐实践活动从不同方面促进了中国音乐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中国走向西方的历史转型。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文化格局的转变在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与确立、西方音乐理论的全面输入、新的音乐思想的成长、新音乐创作与表演的实践等，无不显示了新音乐文化的迅速发展。上述广东籍音乐家在新音乐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均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有的甚至在多个领域成为一代翘楚。比如现代专业音乐教育、音乐学研究与新音乐创作的先驱，被誉为“新音乐的保姆”（刘雪庵语）的萧友梅；中国现代音乐美学的代表人物、作曲家青主；中国近现代小提琴音乐的代表人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等等。笔者曾在《两种新音乐观与两个新音乐运动——中国近代新音乐传统的历史反思》（《音乐研究》2008年第6期、2009年第1期连载）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实质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的“新音乐运动”：一个是以创建中国民族乐派为宗旨；另一个则以救亡与革命为鹄的。在这两种性质不同但同样都对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新音乐运动中，上述广东籍音乐家均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有的甚至成为其中的旗帜性人物。

三、与时俱进和高扬民族精神的爱国者

身处历史转型和民族解放洪流的境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音乐家们大都具有与时俱进的音乐思想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与民族精神。与近现代中国所有音乐家的成长一样，上述广东籍音乐家的个人命运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身上所闪耀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与民族精神，和他们的音乐成就一样值得载入史册。早在济南“五三惨案”爆发后，萧友梅就发表了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抗日救亡歌曲之一——《国耻》；“九一八事变”特别是

“七七事变”后，萧友梅、陈洪、何安东、冼星海、马思聪、李凌等音乐家更是无不以音乐创作和音乐活动为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音乐作品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创作中最能激发民族情感和具有高度历史价值的一部分。有的音乐家在抗战时期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英勇不屈地经受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折磨，比如以歌曲《奋起救国》而在华南地区和南洋一带产生重要影响的作曲家何安东。这样的人格魅力与铿锵有力、悦耳动听的音乐作品一样令人感动。

上述广东籍音乐家中有不少人英年早逝，但也不乏长寿者，有的一直到20世纪末还从事着音乐活动，因此，他们的共同特征一定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音乐家群体和音乐文化现象加以更为全面、深入地整体性考察与研究。当然，这种整体性研究绝非像本文这样一篇浅尝辄止的短文可以胜任。整体观照的起点必须立足于针对一个个音乐家的深入的专题性研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选取了有关萧友梅等近现代广东籍音乐家研究的富有代表性的一些学术论文，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简单却不失学术严肃性的方式，比较集中地展示这些音乐家的音乐成就与历史贡献。此外，有关广东传统音乐新发展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吕文成的研究成果，我们也择取其收入本书，以此略窥近现代进程中广东音乐家群体及其音乐成就的多样性。

事实上，近30年来，有关本书所选音乐家的研究可谓收获颇丰，不仅发表、出版了大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一些音乐家的纪念文集也已陆续出版或正在酝酿出版，如《萧友梅纪念文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文选》等；而在20世纪90年代向延生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一书中，上述音乐家的传记均可看到。因此，将有关这一音乐家群体研究的所有代表性文论汇集再版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我们仅仅挑选了迈入新世纪10年以来富有代表性的部分研究成果。即便如此，受篇幅和本书容量的限制，我们仍不得不忍痛割爱，大量研究成果未能选入，这种遗憾的心情远非说一句“挂一漏万”的套话可以形容。唯望学界广大同仁特别是在对上述音乐家群体研究中有过重要成果而未能选入本文集的学者们谅解。

在编选这本文集时笔者发现，关于广东籍音乐家群体的研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或曰存在比较明显的“热点”和“冷点”现象。比如，关于冼星海、萧友梅、青主等人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日趋丰富；而有关陈洪、何安东等人的研究则有待进一步深入；至于有关留法归国的指挥家、作曲家郑志声的深入研究则付之阙如。公开发表的有关郑志声的较为全面的介绍性研究迄今依然是王震亚先生先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两篇文章。我们选取了其中一篇，希望

由此引起学界对郑志声研究的兴趣。此外，早年留美学习钢琴、曾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乐院且有音乐创作问世的钢琴家、音乐教育家王瑞娴也是一位被历史遗忘的颇有成就的广东籍音乐家。凡此种种无不反映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相对滞后。学术研究的难以推进，主要原因在于受文献资料所限，但由此进一步表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需要深入开掘与研究的盲点，值得学界付出更大的努力。

本文集中所选论文有的是在史料方面进行了较大的开掘与突破，有的是在研究视角方面有了新的拓宽与延展，有的则在研究方法方面引入新的思考与尝试，有的甚至具有重要的史学补白意义，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一个音乐家群体的艺术人生和音乐贡献。至于每一篇论文的内容与主旨，笔者不想在这里作过多的赘述与点评，读者自可品鉴与思考。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大都已在比较重要的音乐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只有崔慧子的《何安东抗战歌曲研究》、翟颖慧的《陈洪早期音乐创作研究》和郭海霞的《欧漫郎其人其文考》三文，是已经通过答辩但尚未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节选，论文的全貌可以在中国知网等相关网站上下载阅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欧漫郎“可能是广东人”的观点还只是一种推测，其身份之谜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和破解，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将有关他的研究也一并收入本文集当中。因为20世纪30年代欧漫郎在广州乃至全国音乐界的影响以及他为新音乐运动所作出的努力，足以使他成为近现代广东音乐史和中国音乐史上不可跳过的一位音乐理论家。笔者曾在几年前对这位神秘的欧漫郎的音乐人生做过一番专门的调查与钩沉，但对其生平资料基本上是一无所获。如今，郭海霞的硕士论文已经在欧漫郎研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节选论文收入本书也是希望以此引起学界对欧漫郎研究的兴趣，从而推动欧漫郎研究特别是有关其生平的揭示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最后，谨向为本文集提供论文的所有专家、学者表示感谢！也期待有关近现代广东音乐家群体的研究和近现代音乐史学取得更大的进步。

冯长春

2011年9月25日于广州

目 录

总 序	黄汉华	(1)
群体的崛起 (代序)		
——近现代广东音乐家研究巡礼	冯长春	(1)
谈吕文成对广东音乐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何 平	(1)
萧友梅“精神国防”说解读		
——兼评贬抑“学院派”成说之历史谬误	居其宏	(4)
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		
——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及其他	梁茂春	(17)
萧友梅留日年份、回国日期及参加清廷考试时间考辨		
——旧资料重读与新史料初探	黄旭东 汪 朴	(25)
萧友梅留德史料新探	孙 海	(32)
作为新音乐批评家的萧友梅	明 言	(57)
萧友梅在莱比锡的留学生涯	王 勇	(69)
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管窥		
——从萧友梅有关音乐教育的几项提案谈起	冯长春	(81)
他是诗人,他在作诗!		
——重读《乐话》随笔	王宁一	(99)
音乐是上界的语言		
——一位诗人作曲家的音乐观	冯长春	(106)
还历史本来面目		
——20 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的“个案”系列之一:陈洪和他的 《战时音乐》	戴鹏海	(122)
一份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贵史料		
——陈洪《绕圈集》解读	冯长春	(138)
陈洪早期音乐创作研究	翟颖慧	(156)

有关马思聪在坪石—管埠的史料	周柱铨	(186)
卷帙望月空长叹		
——析马思聪的艺术歌曲《李白诗六首》	彭 丽	(189)
马思聪晚期小提琴作品中的和声技法		
——以四部小提琴曲为例	樊祖荫	(201)
《黄河大合唱》在海外华人音乐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周广平	(211)
高 AQ——星海事业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	罗小平	(216)
析音乐家冼星海的个性心理倾向性		
——星海事业成功的心理因素探究之二	罗小平	(225)
纪念何安东的历史意义	李 岩	(232)
何安东抗战歌曲研究	崔慧子	(243)
李凌与五六十年代的流行音乐争鸣	项筱刚	(266)
一部重新审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重要史学文献		
——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的史学特色与现实意义	刘再生	(272)
廖辅叔对中国音乐史和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的贡献	陶亚兵	(286)
郑志声先生生平事迹鳞爪		
——纪念郑志声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王震亚	(290)
欧漫郎其人其文考	郭海霞	(296)

谈吕文成对广东音乐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何 平^①

〔题记〕吕文成是“广东音乐”发展中一位奠基性人物，2003年11月，广东省中山市举行吕文成诞辰105周年纪念活动暨吕文成与广东音乐学术研讨会，应大会组委会之约，笔者撰写了此文，以表达对这位音乐前辈的敬意。在文中，笔者提出了吕文成应是与刘天华并驾齐驱的中国二胡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的学术观点。这篇文章后来分别在不同刊物发表和全文转载。

2003年是广东音乐一代宗师吕文成诞辰105年，之所以称吕文成为广东音乐一代宗师，绝不仅仅是因为吕文成突破性地改革了二胡这一传统民族乐器，以及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整套极具南方特色的演奏风格，更重要的是，吕文成一系列的改革、创新，成就了一个新的音乐品种的发展和完善，从而开创了中国民族器乐演奏的新门径，广东音乐也即由此成为世人瞩目、影响遍及世界的中国民族音乐品种之一。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有两位二胡民族器乐音乐家已得到了音乐史学界的广泛认可，一位是刘天华（1895—1932），另一位是华彦均（阿炳）（1893—1950）。刘天华对民族器乐的贡献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民族器乐创作方面，有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两首丝竹乐合奏，这些作品对民族器乐的演奏尤其是二胡演奏技巧开拓了新的领域，体现出刘天华富于个性的创新精神和继承传统并学习西洋的探求精神。这些作品在演奏技巧、音乐结构、思想表达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都显示出与前人不同的更深层次的内涵。

其二，对二胡乐器本身及其相关领域所作的改革，如改良二胡的音色、音质，创造了弓法、指法、演奏符号，使记谱法规范化，采用固定音高定弦法等，促进了二胡艺术向学术层面的发展，并使二胡在高等音乐教育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① 何平（1953—），男，博士，华南理工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其三，编写了包括47首练习曲在内的《南胡练习曲》及一套琵琶练习曲，为建立科学的教学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由此，二胡、琵琶从民间的口传心授方式的教育，步入了具有风格流派特征的整体教育体系的轨道。

其四，发起、主持了国乐改进社的刊物《音乐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使理论研究工作有了重要的宣传阵地，有效促进了中国器乐发展的理论性研究，由此又大大地促进了艺术实践工作的开展。

华彦钧作为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他所创作的二胡、琵琶曲深刻反映了社会底层人们的悲怆心情及倔强性格，其音乐风格清新、刚劲。他所创作的《二泉映月》等三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等三首琵琶曲都有着精湛的演奏技巧，在音乐结构上也较少套路而富于创造性，因而对丰富和发展二胡等民族器乐演奏和创作有重要贡献。

上述两位音乐家的贡献，显现出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正如世界音乐发展的足迹一样，在风格流派的形成方面，体现出了四个方面的内涵：代表人物，包括创始人以及从事此项事业的大批专业人士；由教师和教材等构成的系统、完整的教育机制；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理论研究；反映该风格流派和与之相适应的经典曲目。

从这个意义上看，广东音乐一代宗师吕文成，无论如何应是我国另一位对民族器乐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二胡民族器乐音乐家，他的历史地位应不在刘天华、华彦钧以下，即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刘天华、吕文成、华彦钧应是最具代表性的三位二胡民族器乐音乐家。

吕文成对我国民族音乐特别是广东音乐发展的主要贡献可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在民族器乐创作方面，吕文成谱写了《平湖秋月》、《步步高》、《醒狮》、《烛影摇红》等数以百计的脍炙人口并广为流传的广东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显露出的韵味无穷的地方风格以及悦耳迷人的艺术魅力为广东音乐的完善、流传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其二，其对高胡乐器的改革与创建是对胡琴艺术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贡献。吕文成当年（1926年）受小提琴音色及演奏技法的影响，将二胡丝线改换为钢线，将定弦音提高四度，进而影响了相关的演奏姿势和演奏方式，产生了新的音响、音色，创制了高胡这件乐器，从而改变了广东音乐传统“五架头”的组成，使广东音乐成为独具特色的南方民族器乐品种。吕文成不仅成功创制了一件新乐器，成为广东音乐高胡演奏艺术的奠基人，更重要的是他对二胡乐器的改革，促进了广东音乐的发展，并使这一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他对二胡乐器改革的贡献决不亚于刘天华。

其三,吕文成一生演唱、演奏录制的乐曲及广东音乐数量众多,据统计有270多张唱片。这些唱片为广东音乐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更为研究广东音乐、发展广东音乐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使广东音乐的教学工作有了第一手音响资料教材。

其四,尽管吕文成从未在学校内任职,也并不以教学为生,但吕文成还是口传心授地带出了一些学生(如香港的冯华),这些学生已成为广东音乐发展的中坚力量,影响波及海外。

其五,吕文成不仅擅长演奏,还曾写过一些粤语歌曲并带头演唱,亦被认为是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先驱人物,其演唱的一些粤剧子喉曲目已然成为经典。可见吕文成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演奏家,而是一位有着渊博学识和音乐涵养的艺术家。

广东音乐作为我国民族器乐的一个品种,已完全超越了一种风格流派的范畴。在广东音乐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吕文成所作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他是集创作、演奏(演唱)、乐器改革、教学于一身的一代宗师,他还是第一位专以广东音乐的演出和创作而不依附于其他工作为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作品较刘天华多,在作品的情感表达方面较华彦钧丰富,不仅有反映市民生活情趣的、描写景致的作品,更有表达爱国主义热情的作品。他一生的经历涵盖了风格流派形成的三方面内涵:首先,他是广东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专门从事广东音乐创作和演出;其次,他创作了与该风格流派相适应的经典曲目;最后,他创作、录音的乐谱、音响资料已成为广东音乐教学必不可少的教材和资料。尽管吕文成本人对广东音乐的发展及高胡演奏艺术的发展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著述,但他所留下的乐曲、录音已成为研究广东音乐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料,为理论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和留下了相当广阔的空间。

今天我们纪念吕文成,重要的是学习他对艺术的敬业、忠诚和执著,在当今浮躁心态充斥社会、波及学界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继承吕文成的不断追求和探索的精神。广东音乐之所以有今天,正是因为有了千万个吕文成式的人物在默默地耕耘。我们要保护广东音乐这百花园中的艳丽奇葩并令其长久屹立于民族音乐之林,吕文成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原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萧友梅“精神国防”说解读

——兼评贬抑“学院派”成说之历史谬误

居其宏^①

去年发现、今年公开发表的萧友梅《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以下简称《理由及办法》),虽是萧氏在1937年12月14日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音专”)举办两个养成班陈述理由、提出办法而向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呈递的内部请示报告,但其中所论及的音乐美学思想和音乐教育思想,却为廓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提供了一份极为宝贵的思想材料。因此,它之从历史尘封中被发现,是我国现代音乐史研究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面对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当代学者应当怎样解读?特别是从他提出的“精神国防”之说中,人们可以引出何种结论?本文谨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笔者的读后感,以就教于各位同行与师友。

一、理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论,还是对功能主义的全面皈依?

在这份《理由及办法》中,萧友梅援引西方音乐史上的不少实例,进而得出“凡艺术都是实用的”这个令人惊骇的结论。他说:

严格地说来,凡艺术都是实用的。打开一部世界艺术史,一页一页地翻下去,艺术的实用表白得很清楚;……到了文艺复兴期,因为社会经济的进步和个人主义的逐渐发展,才有所谓“自我表现”的艺术,自拟古主义一直到唯美主义,虽然艺术家们都相信为了“自我表现”而努力,可是他们的艺术到底是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或表现,直接或间接在替某种思想或主义作宣传……^②

① 居其宏(1943—),男,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 萧友梅:《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以下引文凡是未标明出处者,皆引自该文,下不另注。